

从克拉克法则的失败看中国经济 增长与本土经济学的崛起

赵儒煜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我们以动态的、辩证的、比较的观点来考察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批判了以克拉克法则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结构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尽管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已经因“服务化”而大大减速,但这些经济毕竟还是发达的,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家们得以保持傲慢的态度来拒斥来自其他经济的批评声音。因此,中国自己的本土经济学要想在世界上崛起,一方面要以科学的态度去讨论经济发展问题,避免落入西方经济学的窠臼;另一方面,还必须依靠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将为本土经济学的崛起创造有利的条件。

[关键词] 克拉克法则;经济增长;西方经济学;本土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赣内 153(2005)01—0116—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一直在经济学科内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由于其认识方法的局限性也正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理论上的失败和危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西方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

17世纪中叶,威廉·配第第一次就产业结构问题做出推断,克拉克继承其衣钵于1940年进一步提出:伴随着经济发展,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无论从劳动人口比重,还是从国民收入比率来看,均有从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进而向第三次产业推移之势。二战后,库兹涅茨的总结更加证实了配第一克拉克“铁律”是如何准确地概括了现实。60年代中期之后,“后工业化”理论群延伸了克拉克法则而进一步提出,发达国家已超越了工业社会,“服务化”是发展的方向。

然而,现实中伴随着经济“服务化”、“后工业化”的,却不是所谓的“经济发展”,相反是深重的经济危机。日本、美国、西欧国家都是如此。与此相反,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依靠工业部门,^①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呈现出了健康、快速、持续的特点,从实践上质疑了当前仍然是工业社会而非所谓“后工业社会”,质疑了西方传统产业结构理论的理性。扩而大之,新兴工业国通过工业部门带动的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实践的质疑。实践给理论划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因此,我们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的深入剖析,发现了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些规律性问题,证实了传统产业结构理论的错误。

在此,通过对以克拉克法则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结构理论的批判,我们不难看出许多西方经济学的通病,如其理论前提的虚设性、研究者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分析方法的随意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经济稳定、坚实、快速的生长,为本土经济学打破西方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崛起为一个不盲目崇

[收稿日期] 2005—02—26

[作者简介] 赵儒煜(1965—),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① 本论文采用库兹涅茨的产业划分方法,即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部门为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并沿用其名称。

洋、能指导实践的真正有益的经济学, 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基础。

二、中国经济增长对克拉克法则的证伪

我们通过长期动态分析, 对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考察, 得出了与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不尽相同的结果。但是, 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背景的发达国家经济现实不管其是否衰退, 确实已经出现了服务部门比重高的现象。这就为西方经济学固守其陈旧观念、维护其统治地位提供了依据, 对中国经济学人们也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在此, 中国、亚洲新兴工业国依靠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 则以铁的事实证明: 现阶段, 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部门仍然是工业部门, 而不是服务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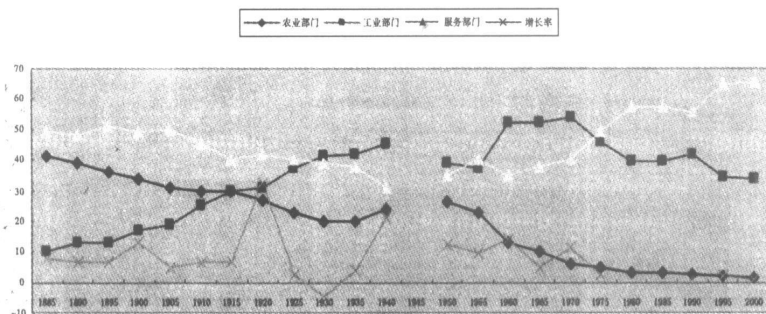
(一)

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表明, 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基本上也是工业部门发展迅速、在产业

结构中比重上升的时期。

日本用 100 年时间走完了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用 200 年才走完的历程, 并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段跳跃性发展的过程, 主要依靠两次工业部门的高涨, 并由此形成了两次大的循环。第一次是 1868—1945 年间, 以 1905—1920 年间为高峰期的第一次循环, 依靠制度性的推进和疯狂的对外侵略掠夺而实现的以工业为中心的快速发展。此间,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4 倍, 工业部门比重从 1905 年的 21.1% 升至 1920 年的 29.1%; 服务部门则从 46% 一度下落到 1920 年的 40.7%。第二次是 1945 年至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 以 1955—1970 年间为高峰期的第二次循环, 依靠制度性推进和国际环境的天惠而实现的以工业为中心的高速增长。在此期间, 工业部门比重从 1955 年的 23.5% 升至 1970 年的 40%; 服务部门则从 58.4% 下落到 54.7%, GNP 年增长率达到平均 9.7%, 制造业增长率则高达 13~24%。^[1] 此后随着经济的泡沫化不断加深, 经济增长率下降至 4.5% 左右。^① 20 世纪 90 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 工业部门未能出现整体上的复苏, 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之中不能自拔。

图 1 日本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



美国既是一个后来居上的代表, 也是盛衰多次循环的典型。它通过工业部门的高速增长带来经济较快发展并超过英国, 确立起了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 而在“服务化”过程中, 又逐步失去其绝对优势, 走向衰退甚至陷入长期经济不振。进入 90 年代之后, 才依靠高科技产业的带动出现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经济增长, 可以

看作两个增长循环过程。其一, 是在 1783 年独立以后至 1929 年大危机之间, 以 1921—1929 年年均增长 6% 为高峰期的阶段。工业部门比重从 1918 年的 27.9% 升至 1929 年的 29.4%。其二, 是 1930 年至 90 年代以前, 以 1933 年至 50 年代后半期年均增长率 5% 为高峰期的阶段。工业部门比重从 1933 年的 25.9% 升至 1965 年的 36.2%, 最高峰时达到 1955 年 39.

① 此处及图 1 中关于日本的数据源于以下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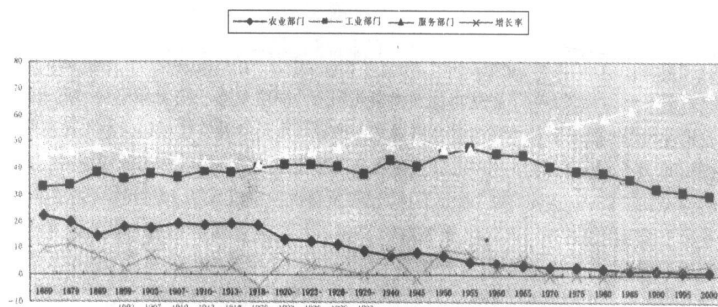
产业结构数据: 1985—1975 年, B. 米歇尔编,《马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I—日本? 亚洲? 非洲篇》, 原书房, 1986 年, 738、739、745 页; 1980—1990 年, 经济企划厅编,《国民经济计算年报》, 经济企划厅经济研究所, 1997 年; 1990 年以后, 日本内阁府网站(www.esri.cao.go.jp/sna/)。

增长率数据: 1985—1940 年, 根据大川一司等著《长期经济统计 I》算出; 1945—1975 年, 同上《马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I—日本? 亚洲? 非洲篇》, 728、732 页; 1980 年以后, 同上《国民经济计算年报》, 政府网站。

1%; 同期, 服务部门则从 65.1% 下降至 60.2%, 最低时为 1950 年的 54.2%。而在 60 年代中期后至 90 年代之前, 美国走入所谓“后工业化”。1989 年工业部

门比重为 29%, 服务部门比重则高达 69%, 经济转向衰退, 经济增长率在 70 年代平均年增 2.9%, 在 80 年代平均年增 1.0%。^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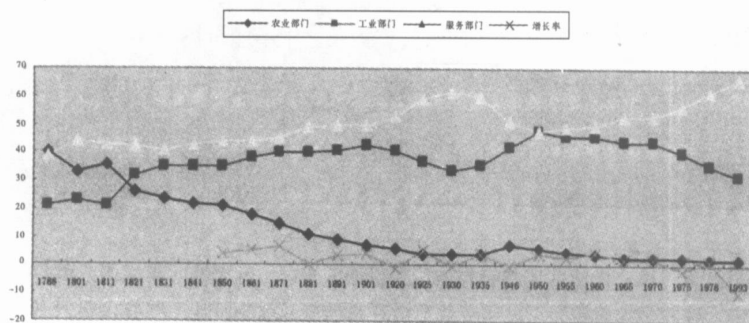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



英国经济的服务化比美国、日本都早得多。工业部门比重从 1953 年后一路下降, 服务部门比重则不断上升, 经济增长率则从 1951—1965 年间年均增长 2.7%, 降为 1966—1980 年间年均增长 2.1%, 1971—1980 年间年均增长 1.8%, 甚至在 1992 年度出现了一 9.9% 的大幅下降。经济衰退从 50 年代就已表现出来。到

70 年代, 表现为工业部门的停滞和爬行式的增长、服务部门的较快发展。80 年代, 英国由于大力扶植工业部门, 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升。90 年代初期, 经济增长速度呈缓慢下降趋势, 使之成为“发达国家病”的典型。^②

图3 英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



(二)

发达国家只是表明了工业部门衰退对经济增长减速作用, 但西方经济学不愿意放弃其现在已经在产业结构上出现“服务化”倾向的依据。因而, 竭力

为其陈旧的理论辩护。在此,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则从正面证明了工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和亚洲的一些新兴工业国。

① 此处及图 2 中关于美国的数据源于以下资料:

产业结构数据: 1869—1937 年, 美国商务省编,《美国历史统计》, 第一卷, 原书房, 1987 年, 240 页; 1940—1975 年, B. 米歇尔编,《马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II—南北美洲·大洋洲篇》, 原书房, 1985 年, 911、918 页; 1980—2000 年, 美国政府网站 (www.bea.doc.go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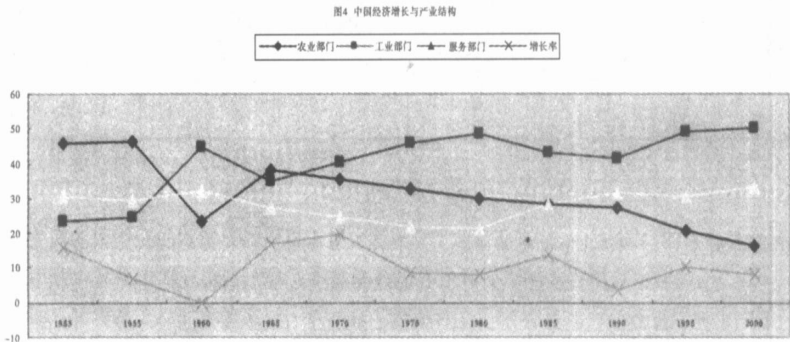
增长率数据: 1869—1910 年, 根据《马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II—南北美洲·大洋洲篇》算出 (对上一年度值, 1929 年价格); 1910—1913 年至 1929—1937 年分别为期间平均值, 1940—1970 年为对上一年度值, 同上《美国历史统计》, 227 页; 1975 年度, 为对上一年度值, 同上《马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II—南北美洲·大洋洲篇》, 897 页; 1980—2000 年, 同上美国政府网站 (www.bea.doc.gov/)。

② 此处及图 3 中关于英国的数据源于以下资料: 1975 年以前, B. 米歇尔编,《马克米兰世界历史统计—I—欧洲篇》, 原书房, 1986 年, 818、826、836、841、845、856 页; 1978 年, 联合国《统计年鉴》1978 年; 1993 年, 日本贸易振兴会,《The World 1995》, 1995 年, 72 页。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在工业部门迅速增长带动下获得了快速发展。相比之下, 与同时期服务化国家经济的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 中国经济渐向平稳而高速增长状态发展。1976~1980 年间年均增长率为 7.84%, 最高年份 11.7%, 最低年份 1.7%。进入 80 年代后, 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开始逐步改善。1981~1985 年间年均增长率 10.72%, 最高年 15.2%, 最低年 5.2%。1986~1990 年间年均增长率 7.9%, 最高年 11.6%, 最低年 3.8%。1991~1995 年间, 年均增长率 11.8%, 最高年 14.2%, 最低年 9.3%。在此期间, 在产业结构方面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我国服务部门长期落后, 而人口压力又相当沉重, 故产业发展是沿着先解决温饱问题, 然后为工业配套, 再大

力发展工业的轨道迈进的。农业部门在改革之初 1978—1980 年间比重从 28.37% 升至 30.40%, 1990 年降至 28.38%, 1993 年再降至 21.20%; 工业部门在 1978—1980 年间从 48.63% 一度微升至 49.04%, 1990 年降至 43.65%, 1993 年激增至 51.77%; 服务部门也随之调整, 1978—1980 年间比重从 23.00% 降至 20.56%, 而后一路攀升至 1990 年 29.97%, 随后降至 1993 年的 27.03%。^① 在此, 既反映出中国服务部门相对滞后, 因而在工业部门带动下也得到快速的扩大; 同时也反映了工业部门的主导地位和服务部门的辅助作用。这说明, 尽管中国和美日等国发达程度相去甚远, 但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同样具有工业部门带动经济增长、工业部门的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特征。



亚洲的韩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 在战后以工业部门为中心推行了以进口替代、出口替代为内容的工业化战略, 使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

这些国家的历程, 同样也说明了工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参见表一。

表 1

新、菲、马三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单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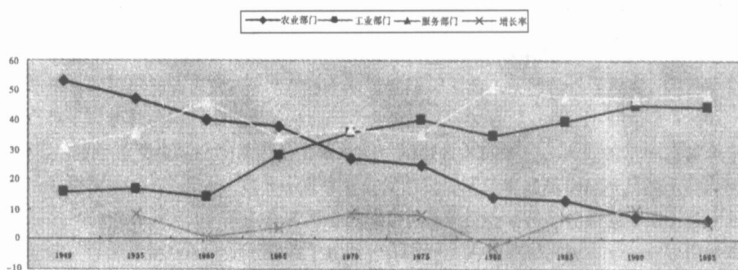
年代	新 加 坡				菲 律 宾				马 来 西 亚			
	农业部门	工业部门	服务部门	增长率	农业部门	工业部门	服务部门	增长率	农业部门	工业部门	服务部门	增长率
1973	1.6	40.1	58.3	—	10.4	35.3	54.3	—	29.0	33.3	37.7	—
1975	1.4	38.6	60.0	4.0	9.7	35.5	54.8	5.7	27.6	32.0	40.4	0.8
1978	1.3	39.2	59.5	8.6	9.6	36.3	54.1	8.2	25.1	34.8	40.1	6.7
1980	1.1	40.4	58.5	9.7	8.5	37.4	54.1	8.4	22.9	35.8	41.3	7.4
1983	0.8	40.7	58.5	8.2	8.7	35.1	56.2	—4.2	21.1	36.3	42.6	6.2
1985	0.7	38.2	61.1	—1.8	8.7	36.2	55.1	2.7	27.8	36.7	35.5	—1.1
1988	0.4	38.2	61.4	11.2	8.3	36.4	55.3	1.0	21.0	39.7	39.3	8.9
1990	0.3	38.0	61.7	8.7	8.0	37.6	54.4	4.2	18.6	42.1	39.3	9.7
1993	0.2	37.9	61.9	9.9	7.6	37.3	55.1	0.4	15.7	44.0	40.3	8.5

资料: 日本银行国际局,《国际比较统计》。

① 此处及图 4 中关于中国的数据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经济统计年鉴 2001》,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年, 59—61 页。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5 韩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



(三)

由上述各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工业部门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本质上讲,这是人类经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决定的。

1. 物质需要是人类需要的基础,它决定了经济社会的核心和动力必然是物质生产部门。

需要是推动产业结构演进的根本动力,需要的各个层次都是以物质需要为基础的。随着收入的增长,精神需要的增长要比物质需要较快,但也是以物质手段的发达为依托的。因此,经济社会的中心必然是物质生产部门,而不可能是非物质生产部门。

第一,物质生活需要是人类赖以生存、延续的保障,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目的和出发点。在早期社会生产力还很低下的历史时期里,农业部门就是经济社会的中心产业部门。而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随着基本的、保障生存和延续的需要逐步得到保障,而且出现了剩余,人们的需要向实现更好的生存和延续来扩大、深化。而所有这些都要求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物质消费品,要求社会生产、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领域里的进步。于是,为满足这些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对原材料不断进行深加工的工业部门迅速发展,超过了农业部门,占据了经济社会的核心地位。

第二,精神需要也是以物质产品为依托的。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精神需要会出现比物质需要更快的增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经济活动将脱离物质产品的生产而转向以非物质生产为中心。因为,人们精神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物质产品消费来实现、以物质产品为依托的。譬如对音乐的欣

赏,有赖于乐器、音响设备的制造和不断革新;对知识的研究和吸收,需要更多的闲暇时间,而闲暇时间是通过提高物质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劳动时间的节省争取到的。

2. 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工业部门具有牵引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从需要结构和消费结构来看,农产品为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必需品。在农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时期,农业部门为经济社会的中心。而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剩余增加,带动经济商业化和工业化,农产品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开始下降。^①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就愈来愈相对落后于对工业、服务业产品需求的增长,促成国民收入在农业部门的减少和在其他产业部门的增加。这种情况进而造成农产品与工业品、社会服务之间的价格差距,使后者可以以较高价格获取较高的附加价值。农业的国民收入则由此更为低落。

与此同时,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的不断扩大,工业品渐渐在需要结构和消费结构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社会需要从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向更高层次的物质精神生活需要不断延伸。而且,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精神消费比物质消费增长更快。前文已述,这种精神需要的满足也是通过物质载体来实现的。于是,社会需要支撑着工业部门比重的不断扩大。而工业部门在满足社会需要过程中的扩大,直接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第二,农产品的收入弹性低,工业品的收入弹性高。进入工业社会之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长,消费的重心转向了工业品,工业部门就会得到相对于农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更多的需要的支持,从而创造更多社会产品,推动经济增长。

服务部门所提供的消费的收入弹性也较高,人

^① 对此,德国社会统计学家恩格尔(L·E·Engel)进行了有力的论证。

们对它的需要也会随收入增加而有快于对农产品需要的增长,服务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也会有相应上升。但由于是在直接、间接地为物质生产部门服务的,而且它的载体是物质的,因而,服务部门的增长是伴随着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增长而增长的。

第三,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农业要比工业困难得多。而且,由于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农业投资很容易出现“报酬递减”现象。这和农业需求的低收入弹性以及工业需求的高收入弹性结合在一起,必然使农业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下降。

相比之下,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较快,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和服务部门,使其创造国民财富的效率大大高于这两个部门,因而其牵引国民经济增长就更为直接,作用更大。因此,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其他两个部门增长更快的时期,往往也就是国民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也往往是工业革命展开的时期。

第四,农业自身的商业化和工业化,也使其一部分原属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通过专业化分工转向了工业部门,如食品加工、棉纺、农具制造等行业通过工业化向工业部门的转移,直接增加了工业部门的构成内容;而且,农业在生产手段上的工业化,如农业机械的普及、化肥的广泛使用等等,也同样推进了工业部门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工业部门内部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生产效率急速提高,直接形成了工业部门的增长倾向。工业部门的这一扩大过程,同时也是技术进步的过程,也必然是经济增长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服务部门也有扩大,但这种扩大是从属性的。因为,服务部门的产生是应物质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为物质生产过程提供服务,不能本末倒置。对此,马克思早已有过论断。“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3] P102}因此,服务部门中的商业不过是为完成产业资本流通过程中的中介作用而存在的;金融业则为产业资本解决资本在筹集过程中和在完成支付手段时的困难而出现的;交通运输业是为连结生产、分配、交换、

消费过程中物质产品的物理位移的各个中介点而产生的。至于那些在个人、家庭、企业、政府领域里的(狭义的)服务业,更是从属于整个物质生产过程的。而且,从量上来看,服务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是由物质生产部门来决定的。“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间的一定关系”。^{[3] P102}服务部门从本质上也不能超过生产需要而发展;超过了就成为多余的东西,不仅无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将成为健康社会肢体的蛀虫。现实中虽然有个别国家存在以服务部门为主的情形,但从国际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以其他国家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为依托的,不能成为独立循环的经济,更不具有代表性。

第五,农业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之土地的有限性和农业的低收入弹性,必然使农业释放出来劳动力流入其他产业。

服务部门易于吸收劳动力,难以形成垄断,致使“服务”这一无形商品相对于工业品这种有形商品的附加价值较少。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即在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不及工业部门一般水平的前提下,这形成了服务部门劳动力较易增加,而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较难上升的特点。但是,服务部门吸收就业的能力也有随技术进步而逐渐下降的倾向。

在吸收劳动力方面,工业部门兼有吸收和挤出的作用。一方面,工业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挤出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业部门的扩大,新兴产业的出现,不仅会直接推进工业就业人口的增加,还会带动服务部门增长,扩大整个社会就业。

3. 各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克拉克法则是片面和错误的。

第一,尽管工业部门、服务部门在长期上都处于波动发展的形态之中,而且服务部门比重扩大还有居高不下的倾向,但从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二者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大量事实表明,工业部门是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之下波浪式起伏发展的,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长较快的时期,往往就是国民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服务部门比重是在与工业部门比重交替起伏的过程中波动式发展的,其比重的相对高涨往往是与工业部门的衰退、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相联系的。在工业部门高涨时期,服务部门随之发展,但增长速度慢于工业部门,故比重表现为相对的下降。而在工业部门因技术成熟、老化而趋向衰落时,服务部门

受物质生产和消费方式惯性延续的影响而继续发展一段时期;同时,由于服务部门的一些领域,如商业、金融、教育、国家机关等部门所提供的服务自身已构成人们生产、生活中的较固定部分,而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技术老化的威胁;甚至一部分服务业部门,如证券业、银行业、期货、房地产等等,都出现了自我循环、恶性膨胀的现象。因此,服务部门在工业部门走入衰退时仍得以维持相对于工业部门较好的状况,从而表现为服务部门比重的相对上升。

由此可见,工业部门的扩大与经济增长的波动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而服务部门则正好相反。

第二,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必然会推动一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反之,由于物质生产部门的落后或衰退,服务部门占据了经济的中心,结果整个经济发展受阻,甚至陷入衰退,最终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落。在16世纪,荷兰曾依靠对外贸易和海上掠夺建立起海上垄断地位,威赫一时,但最后不敌靠工业革命起家的英国,连海上霸权地位也被英国夺去。此后,英国虽然确立起“世界工厂”地位,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和头号强国,但不久又踏上了荷兰的老路,依靠同殖民地贸易生存,日益忽视本国工农业的革新和发展,又被后来居上的美国所超过,成为二流国家。英国的历史,可以被认为是以工业部门为中心和以服务部门为中心发展经济带来不同后果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例证。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人类经济社会只存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个历史阶段,而不存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工业部门的波浪式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工业部门增长较快、比重不断提高的时期,就是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相反,服务部门比重虽然也有扩大,但其急速攀升、居高不下的时期,往往就是经济停滞、衰退的时期。由此可见,工业部门是工业社会迄今为止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西方经济学的弊病与本土经济学的崛起

传统产业理论体系和观点都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以致形成了认为服务部门是经济增长最主要伴生现象的传统观点。在此,我们通过对传统产业理论局限性的

分析,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理论研究上的通病。^{[3]P22-26}

第一,其“经济发展”的理论前提带有虚设性。由于产业结构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社会长期趋势,使得克拉克的“时间顺序”得以无可置疑地替代了经济发展。而随着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不断积累、深化和以危机形式爆发,“时间顺序”不再等于经济发展。因此,库兹涅茨用绝对意义上的定义对经济发展做了约束。而事实上,从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期间来看,经济社会完全可以实现绝对量的增长。库兹涅茨从时间出发所提出的绝对量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前提,已失去了其现实意义,成为“虚设”。客观上,只要一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低于其他国家,就意味着其正处于不断落后的趋势之中。因此,在实践中,从时空双重角度出发的相对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已成为检验经济是否增长的标准。

第二,由于研究者自身出发点的历史局限性,导致了其结论的历史局限性。配第最初的结论,不过是从地理大发现带来早期海上贸易的发达所引出的推断,与工业社会的演变之间尚无紧密联系。斯密的主张显然在英国大获工业好处之后也不再带有说服力。至于克拉克,视角有所扩大,取材从工业社会确立前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个别还有对40年代的考察。由于20年代之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推动力量渐渐减弱,且30年代爆发了大危机,都使服务部门在统计上表现出不断扩大的倾向,最终影响了其对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的分析。库兹涅茨的取材局限于60年代之前,此时第三次工业革命尚未充分显现出成果,故其在此与克拉克的考察期间并无大异。至于后来的“后工业化”理论群,则是将焦点放在70年代之后西方经济走向危机和“经济服务化”倾向之上,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各家对各产业作用的分析也暴露出局限性。如工业部门排出劳动力、服务部门吸收劳动力之说,就是排斥科学技术进步的静态分析的结果。在现代通讯技术和办公技术大规模普及的今天,服务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已逐步接近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并开始排挤劳动力;相反,工业部门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从而带来新的制造业,也具有增加就业的效果。

第三,其分析方法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产业结构理论各派探索者,往往从“经验”的素材中选择那些“适当”的实例来论证其观点。日本经济学家大川

一司指出: 从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中除掉新西兰这类农业劳动生产率突出的国家, 那么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在农业同工业、服务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上, 没有库茨涅兹统计得那么大。而且, 克拉克和库兹涅茨都是以几十年甚至一世纪为考察期间, 只取初期及终期数值。^[4]而在这几十年乃至一世纪中, 不止有一次工业革命发生, 产业结构也有起伏, 但他们对这种起伏的内在机制却有意地加以回避, 以证明其理论的“科学性”。

由此可见, 传统产业结构理论带有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 正因如此它才仅就结构而谈结构, 脱离经济增长而从片面的结构演变中寻找规律。因此, 当我们以动态的、辩证的、比较的观点来考察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时, 其理论与现实的悖反就暴露出来了。

总之,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克拉克法则都已完全暴露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存在, 在根本上是由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局限性决定的。但是, 在发达的经济背景下, 西方经济学仍然顽固不化地老守着他们的陈旧理论。尽管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已经因“服务化”而大大减

速, 但这些经济毕竟还是发达的, 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家们得以保持傲慢的态度来拒斥来自其他经济学家的批评声音。因此, 中国自己的本土经济学要想摆脱落后的地位, 在世界上崛起并获得一席之地, 一方面要依靠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去讨论经济发展问题, 避免落入西方经济学的窠臼; 另一方面, 还必须依靠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在此,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 将为本土经济学的崛起创造有利的条件。我们相信, 在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支持下, 本土经济学在指导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过程中将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 从而在整个经济学体系中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

[参考文献]

- [1] 日本经济企划厅. 日本经济指标[M]. 日本: 经济企划厅调查局, 1980.
- [2]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3] 赵儒煜. 后工业社会反论[M].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 [4] 克拉克. 经济进步的条件: 第 9 章[M]. 库兹涅茨. 现代经济增长: 第 3 章[M].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Rise of Native Economics in Chin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ailure of Clark's Law

ZHAO Ru-yu

(Center for Northerst Asian Studies of Jilin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From a dynamic, dialectical and comparative angle,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long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conomy and criticizes the historical and cognitiv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industry structure theory represented by the Clark's Law. The economic pa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greatly been lowered down because of stressing service, but their economies still stay ahead. So the western economists arrogantly refuse to hear other economic voices. If the native economics of China wants to emerge in the world, its economists must discus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scientific way so as not to be trapped by western economics; meanwhile, Chinese economy must provide forceful support.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ill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rise of native economics.

Key Words: Clark's Law; economic growth; western economy; native economics

(责任编辑: 徐国栋)